

国家“八五”规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

主编：夏之放 刘叔成 肖 鹰（执行）

当代审美文化书系

形象与生存

——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

肖 鹰 著

05

作家出版社

国家“八五”规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

主编：夏之放 刘叔成 肖 鹰（执行）

当代审美文化书系

形象与生存

——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

肖 鹰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肖鹰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7
(当代审美文化书系)
ISBN 7-5063-1051-1

I. 形… II. 肖… III. 审美-研究 IV. B8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101 号

形 象 与 生 存

作者:肖 鹰

责任编辑:王 忻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6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有色曙光印刷厂印刷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70 千字

印张:6:5625

印数:1001—6000

版次: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051-1/I · 1040

定价:16.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导 论	存在与艺术：自我的现代命运	(1)
I	作为历史主体的自我	(1)
II	未定的历史与永恒的反叛	(3)
III	在无限之维的存在与虚无	(6)
IV	文化的意义危机	(8)
V	审美化的当代生存	(12)

上编 向无限的跃进

第一章	怀疑的寻找	(19)
I	无我的历史	(19)
II	走出伤痕的自我	(25)
III	怀疑与诗	(31)
IV	流浪的金牧场	(34)
第二章	无限的反叛	(40)
I	告别偶像	(40)
II	个性的狂欢	(46)
III	叛逆与认同	(54)

第三章	被鼓舞的自我消解	(58)
I	别无选择的无限	(58)
II	个人出世	(62)
III	欲望的风格	(66)
IV	游戏崇高	(72)

中编 走向技术之路

第四章	先锋与技术	(83)
I	诗人之死	(83)
II	在世界之夜	(95)
III	技术化的反叛	(102)
第五章	放逐存在	(108)
I	空间化的时间	(108)
II	话语的逃逸	(112)
III	抗拒情感	(117)
第六章	无主体的制作	(121)
I	技术的诗学	(121)
II	退入生活	(126)
III	被机械复制的存在	(129)

下编 文化的审美时代

第七章	为形象的人生	(137)
I	形象化的存在	(137)
II	生活在幻境	(143)
III	幻象的生成	(147)

第八章	从先锋到明星	(153)
I	偶像的舞蹈	(153)
II	逃避自我	(156)
III	镜前先锋	(159)
IV	错位的祈祷	(161)
第九章	当代都市神话	(165)
I	根的漂逝	(165)
II	怀念情感	(167)
III	交换梦想	(170)
第十章	仪式化的生存	(173)
I	仪式的夜宴	(173)
II	黑色风景	(176)
III	娱乐伤心	(179)
IV	永远的喜剧	(182)
结 论	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	(185)
I	突破形象之围	(185)
II	超越先锋	(187)
III	诗意的守望	(190)
IV	悲剧之思	(193)
V	例示：写作的可能	(196)
后 记		(203)

导论 存在与艺术： 自我的现代命运

I 作为历史主体的自我

无疑，自我是现代文化最核心的范畴。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没有其他任何概念能够比自我对现代文化更具有阐释力，更具有标志特征。正是以自我为标志，现代文化才可能在与传统文化的历史递承中标明自己的独特精神。围绕着自我这一轴心，启蒙、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诸范畴才得到衍生和发展。但是，自我在现代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并不因此是给定的——它既不是一种既成事实，也不是确定不变的。如果说，把自我的现代崛起视作经历了漫长历史发展的人类运动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是在历史中并且是以历史的方式存在的。在文化与历史的统一性关联中，我们真正要揭示的是，自我作为现代文化的核心，首先因为它是现代历史的主体。

在非编年史的意义上，人类世界的现代历史运动发轫于西方，至远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是以科学和人道为两大主题的，而归根到底，是“人的发现”。作为划时代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的人学实质，不在于一般性地发现了“人”，而在于它开始了真正关于“人的自我意识”。一方面，它把人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符咒下解放出来，在向古希腊罗马复归的行动中重申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它对古希腊形而上学的超验意识进行革命性清洗，第一次提出了主体性的要求。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现代西方文化中的神学的解体 and 形而上学的危机。与此相伴随，通过启蒙运动的强化，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康德开辟的哥白尼式革命（即主体性哲学的建立），并且以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完成这一革命。德国古典哲学是文艺复兴人学主题的引申和终结。康德关于“人为自然立法”的命题，费希特以自我为中心建构世界体系的绝对哲学，虽然受到了黑格尔绝对理念的稀释，但是，即使在黑格尔哲学中，主体或自我也被明确建立为世界和对世界的认识的核心。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被称为辩证法的诞生地，而其中自我或自我意识是辩证思维的基本中介。在古典哲学所代表的终结形式中，文艺复兴的人学主题被展现为在世界运动中的人的主体性原则和在主体性活动中的自我意识（个性原则）。就此而言，所谓“人的发现”，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和对个性的高扬。

与文化的人学运动一致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兴和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当自我被确立为文化的核心范畴的时候，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脱离了人身依附关系，摆脱了土地束缚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开发者（甚至是海外殖民者）——现代历史的主体。自由的观念首先是一个经济学观念，它前提性地包涵在商品交换活动中，因为只有以拥

有人身自由的个体存在为前提，商品交换才是可能的。可以说，正是自由的经济学基础，催发了自我意识的文化觉醒，而文化运动又反过来通过对形而上学和神学的革命为自我的历史主体性提供哲学保证和艺术表现。神学的瓦解、资本主义的新兴和自我意识的确立，是三位一体的运动，这一运动开始了世界文化—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世俗化，对于作为现代历史主体的自我，既是它的可能，又是它的危机。世俗化的双重性根源于自我与神学的双重关系：从神学的解放和无神学的沉沦。因此，自我的现代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使自我别无选择地投入历史运动的无限展开之中。向无限性的投入，正是现代历史对于自我主体性的最本质要求。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不是对于神学的反叛，而是现代历史的无限性内涵导致了世界文化—社会的世俗化。因此，神学的瓦解反而是无限性的世俗化的结果。浮士德博士不可摆脱的人生烦厌就来自于对这种世俗化的恐惧，在无限之途，他说：

我听到了启示，但我缺乏信仰。（歌德《浮士德》）

Ⅱ 未定的历史与永恒的反叛

现代文化的反神学精神现实地展开为一场启蒙运动。但是，在现代文化的意义上，启蒙并不是单纯地消除愚昧，而内在地带着破灭以神学形式固定下来的一切既定体系和制度的动机。“因为神话不是别的，而是现存东西的封闭的内在性关联。”^①可以说，启蒙就是由历史的既定（确定）性向历史的未定性的革

① 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403页。

命性转进，而且只有通过这一转进，启蒙才能完成它的反神学使命，才能把自我带入现代运动的无限发展进程中，自由、个性和发展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现代历史所要求的独立个性包涵对历史未定性的认同。现代艺术作为现代史的先锋行动，它表现的前所未有的解放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个性的全面扩张，而且在于它对未定的无限可能性的追求和开拓。因此，现代艺术成为人类空前广泛的试验和努力。现代艺术的反叛风格和整个现代史的“发展意识”是统一的。在这个意义上，自我作为现代历史的主体，既是被历史地先验地设定的，又是在历史中必然地未定的。历史先验地设定了自我承担现代历史革命的使命，但是这使命本身的内容在现代历史运动中是未确定的。这种未定性一方面形成自我最基本的生存情态，一方面构成了自我心理的无意识悬念。“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莎士比亚《哈姆莱特》）这个问题在自我的生存史中是一个原始性问题。进入20世纪，这种悲剧命运的不可逃避产生了自我存在的本体论怀疑，因此，现代文化以现代主义的极端形式成为“我是谁”的生存性追问。

由于历史的未定性，自我成为一个无限的怀疑者。无论是对于休谟式的经验的怀疑论者，还是对于笛卡尔式的理性的怀疑论者，传统的因果律都失去了普遍必然的前提而面临危机。为了解决危机，休谟诉诸自我的经验，而笛卡尔诉诸自我的理性。怀疑主义的无结果的努力直接成为自我的主体性存在的申明和保证。它在哲学上的本体论失败使哲学转换成为自我存在的心理学。与此相应，美学转换成为关于自我存在的浪漫主义的诗学。怀疑主义的自我是一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对现实存在的忧郁的感伤浸透了对遥远未来的原始性的怀想。在这种怀想中，自我必然地具有自然的情怀，而与自然达到深刻的同情

和和谐。卢梭的意义正在于他在自然的深远和无限中发现了自我个性的象征和可能。但是，对于自我，自然只是一个象征，而非归宿。卢梭“回到自然中去”的主张也只是一个象征，只有在对一切既定约束的反叛的意义上，才是真实的。卢梭的真实是一种激情的真实，这种激情是对既定性的反叛的元素。作为一个怀疑的浪漫主义诗人，现代自我在向自然的虚拟的退缩之中，抒发了不可抑制的向未来进发的反叛激情。在其中，浮士德的烦厌、哈姆莱特的犹疑和卢梭的狂热是最基本的元素。

成为一个无限反叛的存在者，是自我的命运。承担这个命运，在积极的意义上适应了现代历史运动的无限发展要求，是自我的个性价值的社会实践；但是，在消极的意义上，它是对世界整体性崩溃之后无可逃避的个体生存的沉沦境遇的接受，而且直接就是一种沉沦。因此，现代历史不断把自我推向尼采的高峰，在这个高峰上，自我必然成为现代运动的文化先锋，同时，在对一切新旧传统的持续不断的对立中进行西西弗斯式的永恒的往返的工作。作为顶峰之上的一个代表，尼采首先发现了神学瓦解（上帝死亡）之后自我反叛的可能，同时也发现了虚无的逼近。他把查拉斯图拉塑造为一个自由而孤独的舞蹈家，而非哲学家或诗人。在舞蹈家查拉斯图拉身上，自我的反叛因为美学的革命力量而被推到了极端，但同时也把反叛的自由与沉沦的悖论推到了极端。在尼采的自我意识中，他无保留地肯定大地的意义，因为大地赋予自我超人的力量。但是，尼采对大地的希望更多地带着一厢情愿的假想，是卢梭式的浪漫主义幻想的回光返照。正如尼采拒绝一切后来者以他为偶像一样，作为现代主义的先锋，他深刻地看到了自我不可超越的孤独命运和非历史性。尼采的伟大正在于，他看到自身的非历史性，并

且始终把自己保持在对于世界的象征距离上^①。

Ⅲ 在无限之维的存在与虚无

通过对凝结为传统的一切既定秩序持续不断的反叛，以自我为主体的先锋运动为现代人类向无限发展的进发开拓了文化道路。无限反叛不仅冲决了传统体系和制度的旧有堤防，而且使一切体系和制度的确定化在根本上成为不可能。在这里，反叛的无限性是针对规范和标准本身的，结果是，无限性，或无限发展本身取而代之成为一切的唯一标准。规范和标准的内在性缺失使现代历史向无限性的进发更多地依赖于内在欲求的外在化，依赖于技术革命的道路。反而言之，技术无限发展需要主体在无限历程中的内在性缺失——价值的削平和中心的消解。在这种相互因果关联中，整个现代历史展现为一个世界一体化的现代化运动。

在最广泛和深刻的意义上，现代化不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事件，而是无限发展的过程。超越一切预设和界限，在向空间作无止境的追逐中，现代化把人类的一切目标，连同欲望本身都捆绑在时间的飞矢上。因此，哈贝马斯说现代化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②。对于这个计划的“未完成性”所要求的心理革命，就是一个通过先锋行动来喻示的新的时间意识：在与传统的持续对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新风格。现代化的无限发展意识把时间绝对化为存在的本体。“只有时间才是构成生命的本质要

①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尹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

② Hal Foster: *The Anti-Aesthetic*, Bay Press, 1983, P3.

素”^①。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自我被迫进入“宇宙级思维”，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列奥塔所说的无限发展要求的崇高语境压力——“发展”成为现在时间的意识形态^②。在这种压力下，进入现代化就意味着进入历史，也就意味着进入对历史的一切可能停滞的持续不断的反抗。在这个新的历史逻辑中，或者在“发展”意识形态的主题化操作中，不仅孤独的自我，而且人类整体都面临着被抽象和整合，因而表现出不可避免的脆弱和片面。

现代化是现代启蒙的终结形式，它把文化—社会的世俗化实现为经济的全面发展和技术的普遍提高，完成了把理性归并入工业的过程，即“把理性从形而上学转化为工具的合理性”^③。通过这一转换，现代化在提高社会对自然的支配力量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两个方面达到的社会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与商品交换的普遍联系中，技术的无限发展包涵着对个体存在和个体需要的普遍漠视，是一种确定的盲目性。工具合理化取消了一切不能统一衡量的东西，所以一切都变成一种物质——商品，人也因此实在化并且商品化。“启蒙精神把有生命的东西与无生命的东西一致起来，而神话则把无生命的东西与有生命的东西一致起来。”^④

由于启蒙向神学的必然性退化，自我个体不可避免地被现代化历程物化。自我在无限之维的存在，是以这种物化为代价的。因此，他的存在是向虚无的冒险，必然包涵着虚无的意义。卡夫卡的写作最深刻地揭示了自我在现代化世界中绝望的挣扎

①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王珍丽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② J. F. Lyotard: *The Inhuman*, Boly Press, 1991, P6.

③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导论”。

④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页。

和必然的荒谬归宿，无论是《城堡》还是《审判》，都是在绝对化的工具合理性控制下的个性死亡，因此，《变形记》中推销员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的荒诞景象却是现代社会自我最正常的结局。在这个结局中，恐惧成为个体存在的本体。在其本体性的恐惧中，深沉的幻灭感，一开始就潜伏在现代人类的深心。20 世纪初，托马斯·艾略特以伟大的洞见把现代世界展现为一片热烈而荒芜的死亡景观。“哦，这么多，我不知死亡带走这么多。”（《荒原》）

IV 文化的意义危机

由于现代化必然向未来无限延伸，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不仅超越传统面向未来，而且突破中西对立面面向整个世界。现代化的无限发展意识对东方和西方文化施加了同样的崇高语境压力。也就是说，无限发展意识把人类的整个历史进程推上无限之维，在无限之维上，任何一个时空点都处于临界状态——面对未来的无限延伸，必然都是零点。现代化的崇高语境压力就是被迫摆脱这种零化状态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面临着同样难以逃避的多种文化悖论，即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域，自然与人化，个性与共性的二律背反。现代化运动导致的根本文化矛盾是，在无限之维上，时间的单向度发展的结果是多向度的文化矛盾的激化。一方面是发展的无限性使任何有限的参照系失去确定意义，另一方面是在无限之维的失恒中寻找确定坐标的强迫性。在这对根本矛盾中，现代化的难题，远不止于认识论的难题，在根本上是存在论、生存论的难题。所以现代化运动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运动，其未来性不仅在于认识的未来性，而且在于存在的未来性。创造一个未来

来的存在，或者存在于未来的存在中，这才是现代化的根本含义。面对未来的存在，或面对未来而存在，就成为现代人基本的存在情态和生存意识。

现代化对每个民族和每个个体，都带来触击根基的震动，被震动的是其内在的价值体系和意义基础。对于一个发展中民族，如果在不能逃避的世界竞争中，现代化带着维护作为民族生存根基的文化传统的目的，那么，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却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进一步丧失，因为它被世界的技术—经济一体化整合入世界体系中，作为一个价值体系和意义中心被无可避免地瓦解了。西方学者保罗·利科尔指出，在实现现代化和重返文化根源，维护古老而休眠的文明和参与世界化文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他说，“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一种文化能承受和容纳现代化的震动”^①。以《根》（哈利）为代表的黑人文学和以《百年孤独》（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文学之所以爆炸性地成为战后的世界性文学，其爆炸性来自于，原始本土文化的飘荡无根和破碎孤离乃是现代文化整合的最普遍景象，是世界性的事件；而且，由于外在压力的强制而流失海外，它就更具象征力地展现了在世界一体化中，民族文化疏离和个体生存飘流的必然结局。在这种疏离和飘流中，民族文化和个体生存都无可避免地景观化——变成纯粹的无意义的中立形象（文化旅游风景）。

现代化对民族文化的整合，把现代文化的自我解放运动推到极端，并且现实化。如果说，现代文化运动的成果是，它不仅使个体摆脱等级制度而成为生存意义上的独立个体，而且使个体摆脱整体束缚而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独立个体，那么，现代

① Hal Foster: The Anti-Aesthetic, Bay Press, 1983, P16.

化的历史情境使自我存在的文化根基在技术的强制性转化作用下，退隐到历史记忆的无限远景中。个体因此丧失内在生存的根基，也因此失去保证自我生存和文化的内在统一性的整体中介。由于失去整体的中介，文化与个体的生存直接联系起来；又由于失去整体性的基础，个体被迫承担起重建自我的文化根基的责任。无疑，历史的现代发展使文化对于个体的外在性转化为内在性，从仪式性的彼岸存在转化为日常性的此岸存在。但是，文化毕竟是人类生存的总体情态和内在基础。文化个体化的结果不仅必然导致整体性的危机，而且必然使个体在获得自我解放和自我独立的同时，沦为丧失生存根基的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

现代主义借助认识论的激进追求解放了个体，使自我独立，但同时也使自我在丧失整体性基础的意义上遭遇失去生存根基的危机。随着整体性丧失的是价值中心的丧失，而无价值中心则意味着意义的根本性阙如，即个体存在的无意义。这种无意义否定了个体关于自我同一性的梦想，并揭示了他的与生俱来的异化本质。阿多诺认为，自我的同一性和自我异化从一开始就是同伴，两者的同伴关系表明文化的主体性运动是服从于商品交换的一体化需要的：“个人独立的过程是商品交换社会的一种功能，终止于个人被一体化所毁灭。”^① 现代主义的激情努力结束于后现代主义的阴晦的叙述中，在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不到一百年，福科哀悼那个杀死上帝的“人”也死了^②，而詹姆逊诸人在“主体的死亡”景象中，直接看到所谓“主体”一

①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59页。

②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3, P385.

开始就不存在，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海市蜃楼^①。

整体性的丧失和同一性的幻灭，使自我的无根基生存成为常态。这种常态化导致文化寻根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寻根对于作为现代历史主体的自我具有命运意义——个体变成一个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但是，由于整体性的丧失，个体的自我文化寻根是在“主体性囚室”中的无望的努力，它不能突破自我闭塞的孤独，最后不得不沉入心理主义的实证和语义分析的缠绕，如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寻根成为心绪和语言的无可约束的滋生漫长。在这种滋生漫长中，文化的碎片跨越整体沉沦的地平线，成为关于生存真实的精神分裂症的臆想，如福克纳笔下的白痴班吉，永远固执着一个弱智儿的残缺记忆（《喧哗与骚动》）。“真实是什么？”^②对于现代艺术，真正成为问题的不是能不能把握真实或怎样把握真实，而是真实本身！由于对真实性的本体论怀疑，毕加索式的立体主义努力归入反形式的形式主义游戏，而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极端行动把艺术对现实的反抗推到艺术的极限而瓦解了艺术，如杜桑和劳生柏，艺术因此成为对生活的现成品或剩余物的直接挪用。真实性的危机和个体自我的生存危机相互纠缠，这一方面强化个体生存的寻根意识，另一方面又使寻根行动在原始性的无望中成为对文化的中立化行为——寻根变成对文化的意义中心和价值体系的游戏。

因此，文化的个体化产生了自我对文化的日常需要，而对文化的日常需要的满足只有通过游戏的中立化活动才能实现。

①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5.

② Roland Barthes: Critical Essay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79.